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⑦

有一次，她去送一份重要情报，将情报塞在竹筐里，上面盖上杂草，假装到坡里挖野菜、打猪草。

两管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了她胸前。她略略一惊，立马镇静下来……

王秀芝：盘起大辫子藏情报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李颖慧 秦青华

“想起那段跟日本鬼子迂回战斗，送情报的日子，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柏兰村92岁的抗战老兵王秀芝激动地说。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见到王秀芝老人时，被她十足的精神头和干净利索劲儿所吸引。虽然脸上布满褶皱，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

乔装打扮 巧送情报

1925年，王秀芝生于胶县蔡家寺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她14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她6岁的弟弟。姐弟三人与父亲相依为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饱受战争之苦。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一年，日军对八路军“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根据地也遭受极大损失，胶县的地下党组织，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努力发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阴历7月15日鬼节，姐姐神秘地将我领到村西头大院内，问我愿不愿意跟着打鬼子干革命。我说，那当然愿意。接着一下出来好几个人跟我握手。”就这样，年仅17岁的王秀芝在姐姐和另一位党员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王秀芝被安排在南梁家中。北梁家中，宋家中，闫家中四个附近的村庄秘密传送情报。

从所在的敌后工作站到下辖的几个情报点送信，王秀芝每次都要经过敌人的几个哨卡，穿梭往来于敌人的眼皮底下。

第一次送情报，王秀芝按照队长的指示，买了几块点心放在篮子里，把需要传递的情报藏在篮子里。路上，她既紧张又害怕，生怕遇到日本兵，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打乱组织的计划，给组织造成损失。她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脑子里温习着出门前老同志嘱咐她的话：“遇到鬼子，就说要去隔壁闫家屯探亲。”

路过闫家屯哨卡时，果然遭到了伪军的盘查：“上哪儿去？”“走亲戚，带的点心，老总你吃了块吧。”说这话时，王秀芝心里吓坏了。伪军抢了几块点心把她放走了。走出去好远，王秀芝才敢大口喘气。其实之前她已经练习过好多次，去闫家屯哪家亲戚，门牌号多少，姓名都一一熟记，就这样，她紧紧地挎着放情报的小篮子，安全地完成

了第一次任务。

“区公所的信交给我，我就往下送；下边的信交给我，我就往上送。当时都是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接情报人的名字，只告诉地址。我脑子好使，方向感强，很快就把情报送到了。”王秀芝说。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王秀芝心中鼓起了勇气，信念开始坚定起来。她想了很多办法送情报：用麻绳把长长的大辫子盘起来，将情报塞到头发里；把手里捧着的小篮子扳开一个小窟窿，把情报塞进去；甚至想出把情报粘到脚底的主意……说起这些来，王秀芝激动地将腿盘起来，越讲越起劲。

一次，王秀芝去送一份重要情报，将情报塞在竹筐里，上面盖上杂草，假装到坡里挖野菜、打猪草。她边打猪草，边观察身前身后的动静。突然，在前方不远处草丛中有有意窸窣窣的响动。很快，两管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了她胸前。“站住，干什么的？”埋伏在草丛中的两个伪军凶神恶煞般地呵问。她略略一惊，立马镇静下来：“挖野菜、打猪草的。”她一边回答，一边把竹筐塞给他们看。一个伪军想把手伸到筐里，王秀芝把竹筐往身后挪了挪，继续说：“村里保长给我们讲了，老总每天剿匪，很辛苦的，要我们给你们送猪犒劳你们。可我家两只猪太小，我想到坡里多打点草给猪吃，让猪快快长大，给你们送去……”两个伪军一听，裂开大嘴，高兴地把王秀芝放走了。

有时，没有送出的情报需要由王秀芝暂时保管，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她把情报塞到屋顶的夹层里。家里住的房子低矮潮湿，看这天天气晴朗，王秀芝把情报放到小院里晾晒。谁料到，院子外突然响起前屋二婶的叫声：“三儿(王秀芝排行老三)，鬼子来啦！”情急之下，王秀芝一把抓起情报跳到南屋门后。身材瘦小的她，紧紧地贴在门后面。这时，日本兵破院而入，拿着刺刀到处搜查。透过门缝，眼看着日本兵直奔南屋越走越近，王秀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砰”一声，日本兵把南屋的门踢开了，一脚迈进来，踩到了王秀芝的衣襟。“我那时真是大气不敢喘，幸好南屋没有窗非常黑，鬼子看不清没进，鬼子脚下就踩着我的衣服角，我吓得浑身哆嗦。”说到这里，依稀能感受到王秀芝当时的紧张。

巧妙设伏 智斗敌人

在不断的磨砺中，王秀芝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44年抗日斗争到了白热化阶段，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一个日本兵，他那滴溜溜的眼神至今仍让王秀芝“心有余悸”。日本兵进

门后看了看，抓起表姐就往外拖，当时家里只有王秀芝、婶子和表姐三人，日本兵腰里还别着匣子枪。

“怎么办？”王秀芝灵机一动，抄起一个扫帚砸向日本兵的后脑勺，高声喊着“快跑！”希望表姐能借此机会挣脱日本兵。与此同时，自己则一个健步从窗口跳出，直奔院子后门喊父亲。父亲闻声赶来时，正好碰上日本兵追表姐。日本兵拔出盒子枪，“呼”的一声，父亲应声倒地。王秀芝吓坏了，但是她不敢犹豫，她身上还需要送出的情报。顾不上伤心，她翻身顺着墙外的土坡滑下，跑向了墨水河边。

这一天，王秀芝度日如年。第二天夜幕降临，她才敢偷偷摸回家里，看到父亲安然无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来日本兵的确向父亲开了枪，但是个空包弹，父亲捡回一条命。

“遇到鬼子扫荡全村时，更是紧张，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王秀芝说。那天，她接到情报，日本兵要对附近几个村庄进行扫荡。王秀芝赶紧跟村里的几个党员骨干商量，把村里群众转移出去。时间紧，任务重。她飞快地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挨个通知准备转移。为了保证老弱病残的妇女、儿童、老人能够及时转移，她找来一辆手推车。老少老刚刚出了村，就发现日本兵到了。这时村民李大妈发现自己的小孙子闹闹没跟来急坏了，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王秀芝赶忙说她回去找了，其余人继续往树林里赶。

王秀芝知道进出村的大路只有两条，机警的她从村中小路绕道来到李大妈家，发现闹闹不在。这时王秀芝已经急出一身汗，眼看着日本兵就要挨家挨户扫荡过来了，这可怎么办？是不是跑到邻居家玩蛐蛐去了？王秀芝急忙翻墙来到隔壁家，果然，闹闹在院子墙角蹲着玩呢。来不及多谈，王秀芝拖着孩子就往外跑。这时，日本兵已包围了大半个村，王秀芝爬上墙头，偷偷观察了一下，东边还没有敌人，她赶忙带着闹闹沿着村东小路跑到玉米地里，趁着玉米地高，他俩猫着腰一路小跑，跑到了偏僻处。

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王秀芝积极参加战斗训练：打绑腿、腰系武装带，身上背着背包，背上插着大片刀，出操、站岗、放哨、练刺刀。在王秀芝的带动下，村里的一些妇女也纷纷加入到训练中来。她们没事就在河滩上、打麦场上、房前屋后积极训练，站岗放哨

监视敌人一点不比男人差。由于王秀芝工作积极、成绩突出，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成了远近闻名的妇女干部。

积极支前 永跟党走

1944年，王秀芝开始担任妇救会小队长，在村里成立了宣传队、秧歌队，积极慰问八路军和照顾抗日军人家属、烈属，担水送柴，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还会组织村民群众给烈军属送慰问品以及进行小型文艺演出。

为前线八路军做军鞋、军衣、拥军袋等是妇救会的另一重要活动。纳鞋底没有麻线，她就用野麻和榆树皮，做鞋没有布，就拆下家里的被面做鞋面。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妇女特别为革命战士制作了镶嵌着红黄蓝白黑5种颜色的拥军袋200多个。她还带领妇女们动员自己的丈夫、亲人积极上战场杀敌，其中王秀芝自己做通了5个人的工作，让他们顺利地参加了八路军。“其实我们都是贫苦大众出身，大道理不用多说，都明白，就是有些妇女同志舍不得，但是大敌当前，保国家就是保小家啊。”王秀芝说。

嫁给烈属家庭是王秀芝铁心跟党走的又一重大抉择。1948年秋天，她听说柏兰村的解放军战士王增义在解放济南战役中牺牲了。王增义的母亲去世得早，家中只剩了他患有疾病的父亲王作连和弟弟王增智，生活十分艰难。王增义写有“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父未能侍奉”的家书以及生前战地日记等传回家乡后，感动了周围村庄的所有群众，也深深打动了王秀芝。为了革命事业，王秀芝一直未谈婚论嫁，当有媒人撮合王秀芝嫁给烈士家属王增智时，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1951年冬天，王秀芝嫁给了比自己还小的王增智。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员，王秀芝依然时时处处做排头兵。她带头参与冲破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自身解放运动，对带辫子、缩臂的、缠脚的妇女进行耐心教育。白天她组织大家努力工作，到了晚上便踊跃报名夜校扫盲识字。她还组织全村妇女参政议政民主选举村干部，并引导她们投入冲破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自身解放运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她们彻底冲破“思想牢笼”，以新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1955年，王秀芝被选为村优秀妇女代表。她既干男劳力的活，又做女劳力的事，用她自己的话说，组织让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任务就



王秀芝

上，没有任务就要时刻准备着上。

1958年，王秀芝又被选为后勤组长，带领着六名女同志为全村劳动力做饭。“这可是个大活儿！”王秀芝为了保证村里每个人的饭量公正，吃饭时她一勺一勺数着，就连剩下的锅底她都不让随便动。“公家的粮食，分分毫毫都要用在刀刃上。”她每天精打细算着怎么给组织省钱，又要让大伙儿吃得好。干活之余，她还自学算盘，平常干活没时间，她就利用烧水的时间学习，九九口诀、加法口诀等等都是王秀芝在那个时候学会的。“那时候每天都会用算盘记记用了多少粮食，还剩多少，不过现在长时间不用就不太起来了。”王秀芝笑着说。

王秀芝虽然只是粗通文字，但很喜欢读书看报，只要看到“有字的纸”就捧在手里，认真地看，细细地读，虽然读起来挺费劲，但她总是坚持看完。她爱听广播，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她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晚必看《新闻联播》。

王秀芝的两个孩子都患有疾病，一个双目失明，另一个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但王秀芝从来没向组织索取过，她说：“我自己能照顾，绝不给组织添麻烦。”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她和丈夫坚持自己照顾孩子，鼓励孩子坚强生活。1999年，她的丈夫王增智因病去世，从此只能靠王秀芝一人担当照顾孩子的重担，无论责任田的管理，还是孩子们的衣食负担，都由王秀芝自己操办。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吃得再好也好，组织待我好啊，前两年把我那个小屋改建成大瓦房。”如今，王秀芝老人，已是满头银发，手指弯曲，但她仍记得当年入党宣誓时的誓言：“永跟党走，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⑧

“红三村”冰冷的水牢里，他和1000多位村民先是遭受日军七天七夜的折磨，后又被押往曹县魏弯镇做苦工。

他想着在这里与其助纣为虐，不如冒死逃跑。一旦成功，便能再回到抗日小学心爱的讲坛，为抗日教育继续贡献力量。

刘效参：死里逃生，继续教育抗日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郭登奎

1937年的春节，是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最后一个祥和之年。曹县韩集镇刘岗村的百姓，并不知道国势日蹙，兵燹将至，还沉浸在新春的喜悦中。

16岁的少年刘效参，刚从桃源镇的高小毕业回家。他准备趁着春节时候，到曾为自己开蒙的塾师家拜年。塾师是村中少有的文化人，眼界不似一般农人。刘效参想，他也许能给自己的前路提点好意见。

冬去春来，岁月荏苒，光阴好似离弦之箭，80载年亦如弹指一挥间。如今97岁的刘效参，身骨硬朗，思维清晰，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80年前的这次拜年，他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塾师之子刘齐滨。刘齐滨曾在北京大学读书，是当地知名的文化人。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刘效参先后加入农民互助会、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此后一心扑在抗战教育事业上，虽历经磨难也无怨无悔。

“不能亲自扛枪上阵杀敌救国，心中肯定多少有些遗憾。但能用教育把抗日深植人心，为祖国培养抗日英才，也是自己为抗战作了点贡献。”刘效参说。

去拜年，入互助会走革命路

1921年5月，刘效参出生于曹县刘岗村的一户中医世家。他的父亲刘纯修，是乡村较为开明的有识之士。刘纯修承袭祖业，悬壶济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在当地颇有威望。1936年，曹县爆发霍乱疫情，百姓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刘纯修不顾个人性命安危，携带药箱走村串户，望闻问切开药写方，在药品匮乏的不利条件下挽救了众多病人的生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刘纯修更是加入“红三村”医疗队，靠着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负伤的战士和村民。

“父亲没有像普通村民一样，养儿只为耕地和养老，而是鼓励我们好好读书，贡献社会。”刘效参说。他先在村中私塾读书三年，后来又又到桃源镇上高小。1936年，刘效参高小毕业回到家中。借着拜年的机会，他准备向自己的塾师请教一二，听听他对自已未来的意见。

“我恰好碰到大我13岁的大哥刘齐滨。他看我给他父亲拜年，便询问我的近况。接着告诉我，自己在村里办了农民互助会，问我愿不愿意加进来。”刘效参问刘齐滨：“这个农民互助会主要是做什么的？”刘齐滨认真地告诉他：“现在的农村像一盘散沙，我们办互助会的初衷就是让农民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团结互助才能力量大

嘛。”刘效参觉得刘齐滨说的确实是对农村有用、农民有益的东西，便点头答应。

教识字，用新课本传新思想

刘齐滨的农民互助会，是在国弱民穷，挽救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成立的。当时不论是创立者刘齐滨，还是参与者的乡村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改造落后乡村的宏愿。

但对于近代中国农民而言，因为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普遍保守，闭塞，固守传统，惧怕改变，不愿意接受任何新生事物。互助会在成立之初，不仅面临人手匮乏的内部掣肘，还要接受农民不理解、不支持的外部考验。那些碍于桑梓情面勉强加入的，其实内心也有怀疑和抵触心理。

刘齐滨、刘效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越来越多的农民打消了顾虑，加入到互助会中来。互助会壮大后，刘效参在村中祠堂给他们上课。他很快变革了传统教育模式，转而注重培养村民的国家民族意识。如今88岁的刘岗村民刘效民回忆，自己读书识字，一开始用的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教科书，内容往往脱离现实，缺乏针对性。“小学国语课本的第一课是看图识字，内容是‘小小猫，跳跳跳’。自刘效参代课后，选用了刘齐滨刻印的新课本，第一课教‘人，我是中国人’；第二课是‘我是中国人，我要爱中国’。”

“他教课不仅内容与以往不同，传播的还是新思想，感觉大不一样。”刘效民评价说。

当教员，筚路蓝缕任劳任怨

正当刘齐滨摸索着乡村改造时，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曹县朝不保夕。

为团结各地的抗日力量，挽救民族危亡，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宣告成立。刘效参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并出席了成立大会。

刘齐滨在曹县统一抗日力量，共产党和八路军则在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8年春，冀南、豫北、鲁西南的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支游击击队伍，初步打开了冀鲁豫根据地的局面。同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部东渡黄河，挺进鲁西南重镇菏泽，在刘岗村一带联合地方抗日武装，组建起冀鲁豫边区支队。第二年的2月，杨得志又率领部分兵力，从晋东南进到濮阳、内黄、滑县一带，和地方武装改编为冀鲁豫支队，开展游击战争，连续取得反日伪军“扫荡”的胜利。当年9月，18岁的刘效参加入中国共产党。

自从抗战爆发后，刘效参就对八路军心之向



刘效参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

鲍青 摄

往。如今他们挺进了鲁西南，刘效参欢欣鼓舞，兴奋非常。他每天都盼望着，自己能够加入八路军，亲自上阵杀敌。但组织上斟酌再三，将他选派到了刘岗抗日小学当教员。血气方刚的刘效参为此郁闷许久，难以打开心结。时任刘岗村党总支书记刘同勤发现后，郑重地劝说，让其去做教员，是组织上考虑他文化底子好，量才为用。刘效参豁然开朗，认为只要好好干，在讲坛上也能为抗日贡献力量。

敌人严密封锁了根据地，企图扼杀新生抗日力量。根据地物资匮乏，不仅百姓生活困难，部队的给养也步履维艰。有几名教员不堪重压，选择回乡务农，而刘效参坚持了下来，自始至终无怨无悔。

教室破漏，刘效参就动员村民拿出木料、茅草和工具，自己亲自修缮。学校缺少桌椅板凳，他便操起铁锹斧头锯子制作。没有教学课本，他便自编自写自刻印。刘效参曾留有10余册当年刻印的书本，现已作为革命文物被山东省博物馆征集收藏。

抗日可以救国，教育可以抗日。刘效参把抗日思想融入日常教学中，培养孩子的爱国热情。一堂简单的小学算数课，他能根据时事提问启发：“八路军一个战士昨天战场上打死了2个日本鬼子，今天又打死了3个，那么这两天一共打死了多少个日本鬼子？”

战争岁月，动荡不安，根据地大小无常，学校也是行踪不定。往往今天在这歇脚，明天就到那

驻足。孩子们每人有一个背包，起床后先打好背包。上课集合背着背包站队，夏天寻觅个树荫上课，冬天找个背风院子读书。上课时，人盘腿坐地上，书包放下来当书桌。午饭后，伙房推着锅灶，找个空旷地面，挖个坑洞，埋锅造饭。

每当日伪前来扫荡，刘效参就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疏散隐蔽学生。本地学生立刻回家，外地孩子则提前认下干亲，发点粮票寄宿在百家姓。

入水牢，九死一生初心不改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壮大，日军也加大了扫荡力度。“红三村”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自身力量也遭到削弱，面积不断缩小。

1943年重阳节拂晓，日军对“红三村”进行突然扫荡，伺机寻找八路军伤病员和后勤物资基地。由于敌众我寡，刘岗村被敌军占领，刘效参逃回1000多名村民被抓。

“鬼子把我们赶到齐腰深大水坑里，威逼我们半蹲下，不准露出胸膛。他们要用这种姿势来折磨我们，让我们供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员。我们要站着就露出胸膛，会遭到殴打，蹲下去污水又会漫过嘴巴，大家只好费力地半蹲在水中。”刘效参向记者认真地比划着半蹲的姿势。

日军不准水牢中的村民吃饭休息，还要挨个拉出来审问折磨。为了不被审讯，刘效参和几个村民使劲在身上脸上抓出带血伤痕。到了日落西山，村民被全部押入小屋看管起来。“当时有人看

到日军堆高粱秆，以为要放火烧房了。大家商定，只要一点火，就往外冲，能逃几个是几个。”所幸后来日军只用高粱秆烧火做饭，并没有烧房子的打算。

刘效参在大水坑中待了七天七夜，几乎没吃也没喝。只有一次有位老大娘来给水中的村民送窝头。为了不被日军阻止，大娘把带来的窝头往水里扔。大家争先恐后接着，刘效参也幸运地拿到一个。他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就将窝头塞到泡在水中的口袋里。饿的时候，就伸手撕一点出来充饥。水坑表面漂浮着白沫，水体污浊肮脏，可生死关头谁还能顾及那么多呢？泡得久了，刘效参藏着的窝头几乎变成了白色的糊糊，但他依然觉得非常可口。

眼看着无辜百姓因受自己牵连而痛苦，人群中的共产党员秦兴体难以忍受内心折磨。他大义凛然站出来：“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不要再折磨乡亲们了！”日军威逼他说出隐藏的军用物资，交待根据地情况。在被拒绝后，日军不断用皮鞭抽打秦兴体躯体，还泼洒硫酸折磨皮肉筋骨。可纵使日军如何施暴，秦兴体仍然一言不发。气急败坏的日寇将他钉在木板上，用火灼烧炙烤，秦兴体终为抗日壮烈牺牲。

在齐腰深的水中，刘效参攥紧拳头，青筋毕现，痛苦地目睹秦兴体牺牲的全过程。日军眼见再怎么折磨也得不到多少有用的信息，便将水牢里的青壮村民押解到魏弯镇做苦工。

给日本人干活，不仅是变相的助纣为虐，更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噩运。自做苦工开始，刘效参和几个村民就筹划着逃亡。纵使逃跑失败，也只是个人的生死而已。一旦成功，便能再回到抗日小学心爱的讲坛，为抗日教育继续贡献力量。

一次外出挑水，刘效参和本村的大憨子(真名赵顺山)、曹楼村的二画皮(真名不详)约定，三人散成左右三个方向分别逃跑。刘效参告诉他们，分散逃跑，生还的机率大。由他自己从最危险的中间方向逃跑，掩护他们从左右侧翼逃走。“我们三个人扔下扁担，那真是发疯似的跑啊。最后也不知道跑了多远，眼看着没人追来，就停下来了拼命喘粗气。”刘效参说。

刘效参听得到村中日军已经撤走，便跑回到家里。父亲刘纯修见他归来，既惊且喜，可刘效参只是一个劲喊饿。村中刚遭日军扫荡，哪有什么粮食。刘纯修抓了一把喂牲口的麦麸，再兑点开水煮熟，刘效参吃完后竟还问父亲，家里的炒面怎么做得这么好吃。

后来八路军主力回到红三村，村庄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刘效参简单休养几日后，又回到抗日小学，继续从事抗日教育事业。

解放战争时期，抗日小学完成历史使命，正式宣告解散。刘效参转而在专区军工子弟学校任教。战争期间，他除了教授文化知识，依旧承担着保护学生的重任。

1952年5月，中央访问团到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红三村”参观访问，当地群众请求在这里建立一所学校，提高农村的思想文化水平。刘效参承担起曹县二中的筹备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建起两排带走廊的教室和160余间宿舍，使学校初具规模。他以身作则，严格治校，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

1981年，刘效参发起成立曹县老干部书画协会，至今还活跃在曹县的书画领域。